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国实学思想史

HANGUO SHIXUE SIXIANGSHI

葛 荣 晋 主 编

韩国实学思想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实学思想史/葛荣晋主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81064-211-1

I. 韩… II. 葛… III. 实学-思想史-韩国 IV. B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0265 号

HANGUO SHIXUE SIXIANGSHI

韩国实学思想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字数 401 千 印数 0,001~1,200 册

定价 28.00 元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韩国实学思想史》，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按照中国人的理论框架和治学方法撰写成的第一部有关朝鲜实学的学术专著。

1996年7月，我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邀请，前去汉城从事韩国学研究。在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参加第四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会议和其他韩国学术会议外，还阅读了不少有关朝鲜实学的著作，使我逐步认识到朝鲜后期实学思想不仅是朝鲜儒学思想发展的高峰阶段，而且代表了当时朝鲜社会的发展方向，含有“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是最接近于韩国近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想形态，是东亚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和剖析朝鲜实学，对于促进东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韩两国实学交流的扩大，中国人如果不研究朝鲜实学，就等于失去了在这一领域的发言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萌生了研究朝鲜实学的念头。1997年初回国后，我即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会提出申请，1998年5月，该组织同意资助我的这一研究课题。在我的策划下，多位中国学者通力合作，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克服了资料收集和语言障碍等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科研项目。这是近年来中

韩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也是中韩传统友谊和中韩学人精诚合作的纪念碑。

针对目前朝鲜实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力图从三个方面有所突破：（1）为了纠正以往有人把性理学与实学对立的做法，我们把朝鲜前期性理学与朝鲜后期实学作为朝鲜儒学发展的同一链条的不同环节加以考察。我们认为，朝鲜前期的性理学有“虚”亦有“实”，是“虚”与“实”的有机统一。正因为它具有二重性，所以，性理学（特别是性理学末流）既是实学的批判对象，又是实学用以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专门研究与阐述了李退溪、曹南冥和李栗谷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并且从实学家的思想渊源上加以展开说明，使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思潮有机地结合起来。（2）针对目前朝鲜实学研究中重“实用”而轻“实体”的倾向，我们在分析实学家思想体系时，力求从体用相结合的高度加以全面阐述，避免把实学家简单地描绘成社会改革家，而是进一步探讨了指导其社会改革的理论基础。朝鲜后期的实学家，多数既是社会改革家，同时也是富有深邃哲理的思想家，是集二者于一身的。（3）针对朝鲜实学研究忽视从当时中朝学术交流角度加以诠释的倾向，我们力求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明清实学与朝鲜实学联系起来，从双向交流和优势互补的层面加以说明。这不仅有益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有利于增进与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项目资金落实后，我即全力收集资料，阅读原著，求访专家，拟定了编写提纲，并着手从全国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作者，组成了一支力量雄厚的写作队伍。每位作者都

是在认真阅读与研究原著的基础上写出大纲，经我审阅后，再动手撰写。几乎每一章都是经我提出修改意见后，数易其稿而成。最后，由我统一定稿。可以说，我们的作者是努力的，治学态度也是严谨的，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毕竟对朝鲜王朝的历史文化及朝鲜实学家的思想全貌缺乏整体的了解，加上语言的障碍，多数作者无法阅读当代朝鲜和韩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这部学术著作能够问世，我们应该感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在资料收集和原著购买中，韩国成均馆大学宋载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姜日天教授、延边大学朱七星、潘畅和教授等都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又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白光洁、总编辑宋焕起、编辑郭来泉诸位先生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向各位教授、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葛 荣 晋

2000年4月8日于寒香斋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时代精神呼唤朝鲜实学	(1)
二、多元文化塑造朝鲜实学	(5)
三、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	(23)
四、双重历史使命	(42)

第一编 性理学与实学

第二章 李退溪性理学中的实学思想	(49)
一、生平及著作	(49)
二、“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的实理之说	(52)
三、“兼理气、统性情”的实心之说	(60)
四、“收敛著实”的主敬之功	(65)
五、“相待互进”的真知实践之说	(70)
六、“以修身为本”的济世忧民论	(74)
第三章 南冥性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83)
一、生平及著作	(83)
二、“诚字在道则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	(85)
三、“为学之实，固在践履”	(89)
四、“修身者出治之本，用贤者为治之本”	(97)

第四章 李栗谷的性理学与实学思想	(103)
一、生平与治学要旨	(103)
二、“理气妙合”的宇宙实体论	(106)
三、心、性、情是“一”而非“二”的“实心”论	(115)
四、“矫气质之偏，复性之本然”的实功论	(120)
五、“祛积弊而大有为”的经世论	(124)

第二编 初创期的实学思想

第五章 李睟光的“懋实”思想	(133)
一、生平及著作	(133)
二、“混沌其物”的实体观	(134)
三、“力行之以尽践履之实”的实行说	(144)
四、“以实心行实政”的治国论	(149)
第六章 柳馨远的经世实学思想	(157)
一、愤世嫉俗的一生	(157)
二、“土地，天下之大本也”	(160)
三、痛革其弊 生民可保	(170)
四、乡约贡举 体道规世	(174)
第七章 梁得中的“实事求是为务”思想	(180)
一、一位“性本质实”的儒臣	(180)
二、“以实心做实事”的治国论	(183)
三、阐发李珥的“理气兼发”论	(188)

第三编 鼎盛期的实学思想

第八章 李瀾的经世致用之学（上）	(195)
一、李瀾及其星湖学派	(195)
二、“穷经将以致用也”	(198)
三、劝善惩恶的史学论	(203)
第九章 李瀾的经世致用之学（下）	(211)
一、以民为本的政治改革论	(211)

二、以农为本的经济改革论·····	(218)
三、注重实证的征验观·····	(222)
四、“凡盈天地间者，莫非气也”·····	(226)
第十章 申景潜的力行务实之学 ·····	(230)
一、务实的一生·····	(230)
二、求实学风·····	(232)
三、舆地之学、园圃之学·····	(235)
四、诗词之学、声韵之学·····	(238)
五、“不可离形器而为道”·····	(240)
第十一章 安鼎福以“下学”为宗的实学思想 ·····	(244)
一、提倡“为学在日用”的一生·····	(244)
二、“士之为学，当观时弊而矫之”·····	(247)
三、“为学之要，不过务实二字”·····	(253)
四、“所谓学者，只是下学而已”·····	(258)
五、《临官政要》的实政思想·····	(262)
第十二章 魏伯珪的经国安民思想 ·····	(267)
一、耕读生活及治学途径·····	(267)
二、弊政救治论·····	(272)
三、安定民生论·····	(277)
四、士习改善论·····	(279)
五、真知实践论·····	(281)
第十三章 黄胤锡的“体明用适”之学 ·····	(285)
一、生平及著作·····	(285)
二、“体明用适，方是儒者大全之学”·····	(287)
三、“大抵西洋之人，惟历算数法等卓绝千古”·····	(293)
四、拯世救弊论·····	(297)
第十四章 洪大容的“经济之学” ·····	(302)
一、生平与著述·····	(302)
二、“满天星宿，无量界”的宇宙自然论·····	(303)
三、“心性不离气质”的实心论·····	(306)

四、知行“不可偏废”的实行哲学·····	(310)
五、“无经济则义理无所措”的经世思想·····	(313)
第十五章 朴趾源的“利用厚生之道”·····	(317)
一、生平与著述·····	(317)
二、“农与士非别人，食与教非二道”·····	(318)
三、“农工商贾，各有其学”·····	(320)
四、“君子哉，富人也！两班哉，富人也！”·····	(324)
五、“盗贼非盗”·····	(328)
六、“秽者不秽”·····	(330)
第十六章 《北学议》与朴齐家的实学思想·····	(334)
一、生平与著述·····	(334)
二、“苟利于民，虽其法之或出于夷，圣人将取之” ·····	(335)
三、商“其一而通于三”·····	(340)
四、“舍旧图新适于时”的改革思想·····	(344)
第十七章 丁若镛的“实践实用之学”·····	(350)
一、生平与著述·····	(350)
二、“太极者，阴阳混沌之物”·····	(353)
三、一生颇倾心于“西学”·····	(357)
四、“继洙泗不传之绪”，以复心性之实·····	(360)
五、“大凡为国之计，贵在务实，不在虚文”·····	(366)
第十八章 金正喜“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	(376)
一、生平与著述·····	(376)
二、与乾嘉学者的学术交往·····	(378)
三、“实事求是”的经学研究宗旨·····	(383)
四、对宋明理学空谈之说的批评·····	(390)
五、以“真兴二碑考”为代表的金石考据学·····	(395)
六、古文《尚书》辨伪·····	(402)
七、《易》为“实象”而非“空虚之言”·····	(404)

八、推崇《海国图志》“不守训诂空言，专以实事求是为主”	(410)
-----------------------------------	-------

第四编 转型期的实学思想

第十九章 崔汉绮“舍虚取实”的实学思想	(415)
一、其人其书	(415)
二、“舍气究理则为虚理，因气究理则为实理”	(416)
三、“去虚无而趋诚实”	(420)
四、推测“不有依据证验，易入于虚杂”	(424)
五、“取于人而为利者胜，非诸人而守陋者绌”	(425)
六、“以事务为学问则实用之学问”	(429)
第二十章 朴珪寿“学以适用”的实学思想	(437)
一、开化思想的先驱者	(437)
二、“生民之本，食与货而已，可不重欤！”	(438)
三、“经世实用之学”	(441)
四、重视自然科学研究	(446)
第二十一章 南秉哲的“格致之实学”	(450)
一、生平与著作	(450)
二、“格致之实学，家国之实用，经世者之所首务”	(453)
三、“只论天人之验否，不论人之华夷可也”	(456)

第一章 导 论

一、时代精神呼唤朝鲜实学

朝鲜实学是朝鲜后期适应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新兴市民需要、代表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社会思潮。

朝鲜实学盛行于 17 世纪至 19 世纪前期的朝鲜王朝，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

壬辰倭乱（1592—1593）和丙子胡乱（1636—1637）是朝鲜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16 世纪末由日本发动的壬辰之战和 17 世纪初由女真发动的丙子之战，造成了朝鲜人口锐减，耕地面积缩小，农田荒芜，国库穷乏，饥民遍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正如梁得中所云：当时“国势岌岌，民生涂炭，危亡之形迫在朝夕，人人抱杞国之忧”^{〔2〕}。但是，作为当时统治者的两班贵族、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则借机兼并土地，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转嫁赋税于农民，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激起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基础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倾轧和

〔1〕《增补文献备考》卷一五四云：“中庙朝，三仓旧储二百三万石。壬辰之初，旧储五十余万石，已缩三分之二，即今人口则比平时仅十分之一，田结则不及平时全罗一道矣。”“军资监平时有三十万石，故癸巳倭贼退去后，尚余四五万石，以助军饷，以赈饥民，今谷仓不满万石。”（《财用考一》）

〔2〕梁得中：《德村集》卷一，《告归疏》，汉城，骊江出版，1985。

斗争也愈演愈烈。继勋旧派和士林派“党争”之后，士林派内部又发生了所谓“四色党争”，动摇了国家政权的稳定，造成了社会纲纪的松弛，朝鲜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中国朱子学自14世纪传入朝鲜后，发展到李退溪、李栗谷时已达到了顶峰，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如果说在朝鲜前期，性理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到了朝鲜后期，性理学则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朝鲜王朝后期，由于两班贵族的腐败与无能，作为统治思想的性理学及其末流，只是整日围绕“四端七性之辨”、“人物性同异论”和“礼讼”等问题展开无谓的激烈辩论，使性理学完全堕落成为脱离实际的空疏之论而丧失其活力，并且在辩论中分裂成许多政治派别，性理学不过是党争的工具而已。性理学者面对壬辰倭乱之后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由于华而不实，思想僵化，而束手无策，只是从“义理论”的视角加以分析，空洞地说什么对敌人如何不义，如何做才符合义理，主张以义理论抵抗外族侵略等。性理学者企图以空洞的义理论来解决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表明它已完全丧失了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正如丁若镛所云：“今之为性理之学者，曰理，曰气，曰性，曰情，曰体，曰用，曰本然气质，理发气发，已发未发，单指兼指，理同气异，心善无恶，心善有恶，三千五桠，千条万叶，毫分缕析，交嗔互嚷，冥心默研，盛气赤颈，自以为极天下之高明，而东振西触，捉毛脱头，门立一帜，家筑一垒，毕世而不能决其讼，传世而不能解其怨，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同者截之，殊者伐之。自以为窃所据者极正，岂不疏哉！”〔1〕所以，从地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改革派不能不把视线由空疏之论转向现实社会，由“内圣”转向“外王”，由“正德”转向“利用”、“厚生”，在性理学的价值观之外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实学家，虽不能从封建制度本身去寻找

〔1〕丁若镛：《与犹堂全书·诗文集》卷十一，《五学论一》。

社会危机的原因，但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它是由性理学及其末流的“不实之病”所造成的。实学先驱者李睟光指出：性理学“虽有志于学，不能实用”〔1〕，“以致绩用无不成，治效蔑著，国事日以委靡，朝纲日以紊乱，是则无他，皆坐不实之病也。”他主张“以实心而行实政，以实功而致实效，使念念皆实，事事皆实，则以之为政，而政无不举，以之为治，而治无不成”〔2〕。朴齐家作为利用厚生派的代表人物，亦认为性理学之弊不在“穷理”，而是“初学后生高谈性命”而“不急于实用耳”。正是在这种“急于实用”的思想指导下，实学家们开始从空疏的性理学中解脱出来，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历史、军事、文学、语言、风俗、音乐、科技、工商、交通等领域，努力探求经世之方。19世纪前期的著名实学家崔汉绮针对性理学的“不实之病”，批评说：“凡百事物，皆是真切学问，舍事物而求学问，乃是空底学”〔3〕。又说：“西教之蔓延天下，不须忧也；实用之不尽敢用，乃可忧也”〔4〕。他反对锁国政策，主张门户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容纳西洋文明，以求振兴国家。

自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之后，地主阶级改革派自我反省的中心问题是：朝鲜王朝何以衰败？如何拯救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在探讨与回应这一时代挑战时，他们从沉痛的历史反思中认识到由虚返实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抛弃性理学末流的“悬空底学”，大力提倡“以实心而行实政，以实功而致实效”的实学精神，才是拯救时弊的惟一途径和方法。“由虚返实”标志着朝鲜后期儒学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正是在这种“由虚返实”的时代精神的呼唤下，才逐步萌生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社会思潮，为儒学的自我调整切实地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要

〔1〕 李睟光：《芝峰集》卷二八，《秉烛杂记》。

〔2〕 同上书，卷二十二，《条陈懋实札子》。

〔3〕 崔汉绮：《人政》卷十一，《事物真学问》。

〔4〕 崔汉绮：《推测录》卷六，《东西取舍》。

求，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朝鲜实学除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意识外，还是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启蒙意识的反映。自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后，随着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中逐步分化出了以私营手工业为主体的手工作坊，在各地出现了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朝鲜前期推行的官营手工业体制趋于崩溃，逐步为“赁用私工”的私营手工业体制所代替，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不管是在京工匠还是分布于外八道的工匠，随着手工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出现了雇佣制的手工业作坊，孕育出了新的市民阶层。商业经济在农副业和手工业扩大的基础上也逐步地发展起来，除了京城的“六矣廛”外，还在广大农村开设了一千多个乡市。在这里，既有坐商也有行商。对外贸易也有所扩大。除了与后金在合宁、中江开市外，还与清朝在鸭绿江附近开设了栅门后市。同时，朝鲜也与日本恢复了双边贸易。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多为民间私人贸易。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委托贩卖的“客主”、介绍买卖的经纪人和通融资金的贷金业者。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正式铸造与发行货币，逐步将民间以米、布为主的流通手段排挤出市场，使货币成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萌生出了反映新兴市民利益和愿望的启蒙意识，并且成为韩国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时代需要实学，时代呼唤实学。产生于朝鲜后期的实学思潮，是由当时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革新思想和新兴市民阶层的近代启蒙意识汇合而成的。这是朝鲜实学思潮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多元文化塑造朝鲜实学

朝鲜实学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上述社会基础外,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建构朝鲜实学思想体系,还必须吸收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方可实现。如果说朝鲜前期是以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等人为代表的性理学独于一尊的话,那么壬辰倭乱之后,就已不再是性理学一统天下的时代,而由一元转向多元。除了正统性理学外,还有从中国传入的明清实学与从欧洲传入的“西学”,三者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逐步形成。这种多元异质的文化氛围为实学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实学家们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从体用结合的高度立论的。在性理学思想体系中,有“虚”亦有“实”,是“虚”与“实”的有机统一,具有二重性。所以,实学家在清算与批判性理学的“不实之弊”的同时,也从性理学中吸取了它所蕴含的实学思想。

从“达用”(“实用”)层面看,李瀾虽然公开承认“退溪,吾师也”,并将退溪的精粹之语编辑成《道东录》,但是,他对退溪理学的“未及政事”的弊病也提出了批评,指出:“退溪之书,专功于本源伦行之间,未及政事。当时法令糜弊,非穷变将通之会……略言时务之大者,庶几五年七年之效,方是无憾”〔1〕。在清算过程中,他走向了“留心世务,凡于国政之弊坏,民事之艰难,默究弊原,咸思救策”〔2〕的社会改革之路。安鼎福不满于性理学者“以下学为卑贱而不屑焉,常区区于天人性命、理气四七之说”,结果造成“终身为学,而德行终不立,才器终不成,依然是未曾为学者模样”〔3〕。他公开标榜自己以“下学”为宗,大力提倡“唯当求古

〔1〕李瀾:《星湖先生文集》卷十上,《退溪条》。

〔2〕李秉休:《家状》。

〔3〕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十九,《题下学指南》。

圣贤实用之学”〔1〕。反对“高谈虚远，支离辞说，无实用也”〔2〕。在由“高谈虚远”向“实用之学”的转变中，实学家们既批判地吸收了李退溪的“以修身为本”的济世忧民论、曹南冥的“修身者出治之本，用贤者为治之本”的内圣型经世思想，也直接继承了理学家赵光祖、李栗谷的“祛积弊而大有为”的外王型社会改革论。实学家魏伯珪“一依栗谷隐屏规”，“昼讲小学，夕讲《击蒙要诀》”〔3〕。如果说在传统的“正德、利用、厚生”的儒家价值观念中，性理学者关注的中心是“正德”而非“利用、厚生”的话，那么以北学派为代表的实学家则把“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结合起来，并将自己关注的重心移到“利用、厚生”之上，大力提倡“无经济则义理无所措”的经世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洪大容称赞《圣学辑要》为“经世有用之学”，公开把李栗谷等人的变法思想奉为圭臬。

从“实体”层面看，实学家对于性理学既有批评，亦有继承。在理气关系上，实学家是通过李栗谷的“理气妙合”论而向徐花潭的气本体论思想回归的。李栗谷依据他的“理气妙合”论，肯定理气非“二本”，指出“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4〕。立足于这一点，他批评李退溪的理本论是“见有未莹，言或微差”〔5〕。同时，他依据“理气妙合”论，指责徐花潭的气本体论有“认气为理之病”〔6〕。可见，李栗谷的“理气妙合”论是从李退溪的理本论转向实学家的气本论的中间环节。实学家梁得中曾依据李栗谷的《天道策》而作《性与阴阳策》，批评与修正了李退溪、李栗谷的理气二元论倾向，指出理气“互发、随乘、内出、外感之云，似不免有二歧之感”〔7〕。同时，他又肯定李退溪的“至虚而至实，至无而至有”的实理之说和曹南冥的“诚字在道则为实

〔1〕 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十四，《德谷书斋月朔讲会约》。

〔2〕 同上书，卷八，《答南宗伯书》。

〔3〕 魏伯珪：《存斋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年谱》。

〔4〕〔5〕〔6〕 李栗谷：《栗谷全书》卷十，《答成浩源》。

〔7〕 梁得中：《德村集》卷七，《上明斋别纸》丙戌。